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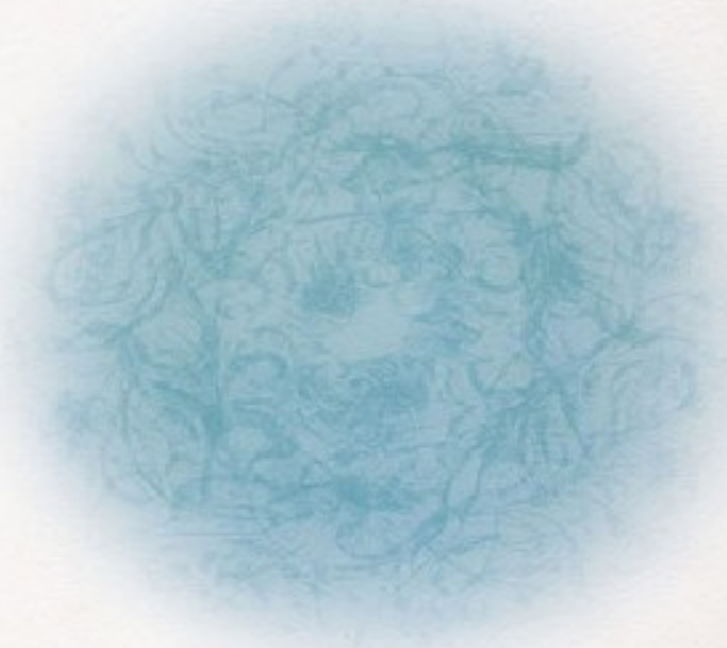


Beijing Daxue Bijiao Wenxue Luesha Wenku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

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 文化特征 ——王韬研究

王立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
教育部 211 学术科研项目

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 形成的文化特征

——王韬研究

王立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王立群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301-14905-8

I. 中… II. 王… III. 王韬(1828~1897)—人物研究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465 号

书 名: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
著作责任者:王立群 著
责任编辑:凌玉建 张 冰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4905-8/K·058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29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王韜像 同治七年(1868年)王韜訪歐時于倫敦所拍攝之照片

出版总序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是近数十年来以北京大学学者为主体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集成,它是这个学术群体数十年来在“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中所积累的对于这一学术的理解和从事的学术实践,现在以“系列书系”的形式公刊于世。

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复兴以来,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路程。如果从学术层面上考察,可以说出现了三代主峰。以朱光潜、黄药眠、杨周翰、李健吾、钱钟书、季羨林、金克木、李赋宁、周珏良、陈嘉、范存仲诸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文革”之后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第一代学者。以乐黛云、饶芃子、陈惇、钱中文诸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繁荣和发展的第二代学者。目前,在跨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第三代学者。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人。在几代主峰中间,也都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的学术桥梁。前一代主峰学者的学术与精神正是经由这些“学术桥梁”传达到了后一代的主峰层面上,承前启后,把学术推向新的境界。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与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的轨迹相一致。它的前身“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创建于 1981 年,由杨周翰教授领衔主其事。这正是第一代学者们致力

于复兴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产物。它被定位于北京大学,或许这正体现了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与新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

1985 年,我国教育部批示同意北京大学把“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改建为具有独立建制的实体性的“比较文学研究所”(1993 年,北京大学校长会议依据学术研究的需要,决定将该所更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以季羨林教授为顾问,由乐黛云教授为所长。不久,乐黛云教授又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理事、副会长。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国联络处的所在单位。这一系列的文化事态,便成为在 80 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经过近十年的复苏准备而进入向其学术峰面跃进的标志。

此后的 20 年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与全国学术同仁共同努力,希望在这个长期被忽视而又对于我国人文科学在世界崛起具有相当意义的学术领域中能够有所作为。尽管研究所的规模不大,教学与科研人员不多,但全所对于学术的忠诚不敢懈怠于片刻。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支持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不仅在国内学术界而且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在三个层面中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

第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在我国高等学校比较文学研究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中率先建立起了“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的完整的学位学术体系。国内和国际上对比较文学学术有兴趣的研究者在这里经过严格的、规范的训练,造就成比较文学学术领域中强有力的学者,他们既在国内的学术界,也在欧洲、北美、日本、韩国和澳洲等广袤的学术领域中发挥着积极的学术作用。与此同时,20 年的人才培养也使我们对于在中国人文环境中如何造就以本民族文化教养为基础的具有世界性多元文化思维能力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体验愈益深入和深刻,成为不可多得的学术财富。

第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组成的学术群体,以自己坚韧的学术精神和相对坚实的学术功力,以他们勤勉和聪颖的智慧,在继承本学术领域内相对稳定和合理的公共成果的基础上,以创造性的精神,拓展和深化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层面。由这一群体所

特别提倡并躬身持久实践的比较文学的“发生学”、“形象学”、“叙事学”、“阐述学”、“符号学”和“比较诗学”等学术层面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进展,从而把对“比较文学”的学术认识从它的功能价值与社会作用引向了对学术内奥的研讨,把传统的“传播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综合而融为一体,推进了把文本实证与理论阐发相互贯通的多层面的原创性思维,显示了以中国文化为教养的世界多元文化精神、文化观念和方法论特征。今天,我们可以多少有把握地说,这一群体已经开始具备了捕捉国际学术发展新趋势,回应本领域中相关学术挑战的能力。

第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组成的学术群体,不仅已经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而且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学术声誉。其标志有三:一是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已经在本领域中建立了高层次的多项目的国际学术合作,其学术成果为学术界所认定,其中有获得国际(政府间)组织所授予的“学术类金奖”的荣誉,且目前仍然继续着这样的国际学术合作。二是本学术群体的成员,全部在研究对象国有过“学位留学”、“学术讲学”和“研修养成”等广泛的学术文化体验。其中有些先生的学术信念和学术观点为相应的对象国学术界所重视,在国际同行中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和学术声望。他们的著作被指定为大学研究生的“必读书”;他们在国外学术会议中,经常作为“基调报告”和“主题讲演”者出现,从而开始实现以“自我学术”为基点融入并推进国际学术发展的“全球学术”势态。在这一过程中,相应展示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的人文学术的某些风采特征。三是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成员,先后并长期承担着国际比较文学学术组织的负责工作。除乐黛云教授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外,孟华教授长期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严绍璁教授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东亚研究委员会(CEAS)主席,并先后担任在日本大阪成立的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常设)副会长、会长等。由此而使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有可能实际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运作,并相应地表达中国学者的声音。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数十年来随着祖国在世界

的崛起,在丰富多彩的人文学学术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取得了这些微薄的业绩。正当研究所准备回顾自己的学术踪迹,结集自己的心得之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课题被纳入北京大学“211”学术规划之中,经我国教育部专家组审议予以认定,从而得以公刊于世。

本“文库”的内容暂定为两大系统。一是20年来,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在邀请与接纳世界各国学者来本所讲学的同时,本研究所的教授也在世界许多国家有过许多的讲学和讲演。他们使用对象国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沟通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与国际的联系,展现中国和北大学者的学术业绩和人文精神。“文库”对此加以编辑为《海外讲演录》,仍然使用作者当年讲学和讲演时的“对象国”语言出版,以便对他们在世界各地学术界表述的“中国声音”进行“保真”。第一期先行刊出英文版、法文版和日文版三卷,以后还将继续结集公刊;二是这一学术群体成员在多元文化层面中所做的具有学术意义的专门著作。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在近四分之一世纪中成果殊丰,但在作为比较文学学术内奥的各个文学与文化层面上则还未见有切实的阐述研究。本研究所致力于推进把文本实证与理论阐发相互贯通的多层面文化的原创性思维,在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形象学研究、比较诗学研究、阐述学研究和文化学研究诸多领域,做了探索性的努力,分别撰著为专题研究的论稿。第一期先行刊出四卷,以后将会陆续公刊。

参与“文库”著作的作者大约有三个层面,一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成员,二是在本研究所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成员,三是参与本研究所课题研究的特邀成员。

我们希望这一“文库”的刊行,能够把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在一般概念阐述的基础上引向更加深入的学科的各个研究层面,展现学科各个内在领域的内奥与各自的特征,逐步形成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术”。

我们衷心地期望有更多的学者在同一学术目标下有着更加广泛和切实的合作,也诚恳地期待在阅读本“文库”过程中各位读者的批评指正和提出各种商榷感想。

本研究所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承担本“文库”的出版, 特别感谢出版社副总编张文定先生、外语编辑室主任张冰女士与各位编辑的辛勤劳作。

严绍璿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主编

(2004年清明之日撰于北京大学静园六院)

序 文

严绍澍

19世纪中期开始,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发展和冲突,也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开辟世界市场而对中国造成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军事的压迫,植根于农业经济的长期的中华帝制政治,以及粘着于此的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开始了重大的转型。这一转型当然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体现这种时代转型的最前卫的代表,便是在这样多层面的文化语境中,生成了中国最早的与传统文人在社会理想、知识取向、价值论定、行为规范以及认知方式等等层面中不尽相同或不相同的“知识人”新的群体,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雏形。

研究并阐述这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把握他们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与资本主义新文明的冲突中形成的文化特征,这对于科学地解析中国近代文明形成的历史轨迹,具有极为重大的学术意义。

王立群博士选择以19世纪中期,在英国殖民主义强迫中国实行“五口通商”中最早出现于上海的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江南文人王韬(1828—1897)作为论说对象。王立群博士认为,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起始时期,“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囿于传统的思想和生活模式、对外面的世界缺乏必要的认识和了解的时候,(王韬)他却率先将一只脚跨入了新的世界,倡导西学,倡导改革,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因而作者界定“王韬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本书试图通过对王韬以及以王韬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知识人群体的生存经历的探讨,阐明处在这一重大转型的初始时期的中国这一新的知识群体的心理形态与文化特征。

关于王韬的研究,30年前学界关注得还不多。1987年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出版了题为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的专著,此书在十年后才有中译本《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1998)刊出。这期间逐步关注这一课题的中国学者大多是以专题论文表述见解。1999年学术界在香港举行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会议。本书著者王立群博士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史上这样一位杰出的先行者,她的研究至今已有十年之功。本书则是她长期以来围绕“王韬研究”这一大主题广蒐材料,拓展视野,反复思索,提升理念,力主在这一特定时空广泛而复杂的文化语境中,从相关的世界文化运行的视角,来考察王韬从旧式文人向艰难地接受近代文化的知识分子迈步的心路历程。由于这一重大的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是与王韬本人长期生活在国内外海岸通商之地相关,故著者把这一类从传统文人中“变异”出来的“知识人”称之为“口岸知识分子”,意味隽长。

以我个人知识的理解,王立群博士的这一著作对于比较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其学术贡献至少可以概括为下述三个层面。

第一,本著作严格遵循人文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原典实证的理念和方法论”展开,在关于本课题研究的原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条析方面,其丰富性和完整程度,是迄今没有其他的论著能与之相比的。其中,三个领域的原典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无疑为以后的“王韬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1. 关于从1849年王韬由家乡小镇到达上海,进入由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做编辑的13年间的学术文化经历和观念认知变异的轨迹,本书作者做了大量的实证性考查,对于“墨海书馆”整体上从发足到运行的全貌,包括精神文化层面的生产与物质技术侧面的装备,进行了全方位的原典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进而厘清了传教士队伍的成分和由王韬陆续引进入“书馆”工作的所有中国学人的学术特长、文化状态与心理倾向,从而首次展现了中国最早的“口岸知识群体”的基本面貌。

2. 收集整理了由王韬创建的中国第一份“日报”——《循环日报》

(1874年2月4日创立)的部分报刊和相关材料^①。以往探究王韬的论著,在涉及王韬《循环日报》时,几乎都未能读到该报,有些学者甚至申言这份报纸“已经逸失”。本书作者进行了相当艰苦的调查,终于从北京、上海、广州和日本等地,得到了《循环日报》的三分之一的出版页,并且复制成册。本书有关论述据此立论,弥补了王韬研究中的这一空白。不唯如此,而且也弥补了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缺漏。

3. 本著作对于王韬在日本考察中与他接触过的日本各阶层人士,做了极为详细的调查,为此建立起了118人的档案。这对于理解王韬在日本的思想变异,提供了最具有基础性的原典材料,补足了以往研究中未能顾及全面的缺漏,而且,这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积极意义。

第二,本著作把王韬以及以王韬为中心的这一新的知识群体,界定为“口岸知识分子”。以此指称中国最早一批开始在文化意识和心理形态诸层面“转型”的具有近代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这一名称的确立,意在表明他们的“转型”是在以上海为中心,兼及广州、香港和在欧洲和日本的各个“口岸城市”的复杂的“文明形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名称目前不多见于其他学术论著,却表明本著作作者是自觉地采用“跨文化”与“跨文明”的观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观察与思考命题,体现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立场,极具学术活力和相应的隐喻意义。

第三,本著作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致力于阐述中国第一代从传统文化中脱出的新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特征,表述了像王韬这样的转型知识者,虽然接受了近代文明和文化的洗礼,却又要处处表明自己

^① 关于《循环日报》是否是中国第一份“日报”,学界尚有不同的说法。依据我2009年2月5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读到的《香港报刊及文献缩微资料介绍》,其中第3页说“《唯一趣报有所谓》是香港第一张小报,由郑贯公1905年6月4日创办”。但《循环日报》则是王韬于1874年2月4日创办的。又有学者谓在《循环日报》之前的1872年4月由当时的China Mail(德臣西报)的副主笔陈霭庭创立了《华字日报》(Chinese Mail)当为中国第一份“日报”。但《华字日报》的初期其主要消息和相应文稿大都来自China Mail,事实上它是作为China Mail的中文版以争取中国人读者,后来则逐渐独立运作。由此观之,《循环日报》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中国的“日报”。此报在1879年后的一段时间内把每天的出报时间从早上提前为前一天的晚上,又成为中国各种“晚报”的滥觞。

对传统文化的“忠贞”，比较详细和深入地阐述了他们在新旧文化和文明冲突中的彷徨、徘徊和内心的痛苦；作者特别关注在王韬自身的生命进程中，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中，近代文化意识的建立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本著作在阐述中国第一代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特征时，是以一种“能动的历史过程”的观念，加以探讨和表述的，这与某种凝滞的观念来解析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不相同，具有更加接近事实本相的价值意义。

作者掌握了关于本主题的相当丰富和完整的资料，在理性认识方面做了深入的思考和阐述，这显现了作者在一般文化学理论和近代史诸领域内的学术素养。体现了著者具有较为丰厚的学识修养，具有相当的学术思考和较高的学术综合能力与表达能力，其研究成果令人信服。

我与王立群博士相识多年，她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从事比较文学的学习研究，先后在此获得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她在学问上始终坚持学术本位，不务时尚，淡静深虑。我印象最为深刻者则是她一直尝试把“比较文学学理”中最基本的“跨文化”学术立场和“多元文化语境解析”运用于“一个文本”的研究中，本著作对王韬的研究，正是多年来这一理念的实践。

30余年来，我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已经成长出一批年轻的研究者，他们以敏锐的学术感悟，领会与把握本学术领域的前沿理念，又以孜孜不倦的学术努力，积累与融汇相应的多元文化学识，勤奋踏实地从事比较文学的“本体”研究，我相信这样的学术表述，即使在若干层面中尚显得稚嫩，但这些成果的累积将是本行业学者提供给学术界的真正的智慧财富。

我读了王立群博士的这部著作，有感而述，蒙她的好意，作为序文。

2009年2月9日己丑年元宵
撰于港岛 Park Towers 寓所

导 言

在清朝帝国没落、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出现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初步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社会逐步形成新的认识,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通商口岸是西方人活动最频繁、西方文化对中国冲击最大的地方,这批知识分子首先出现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口岸城市,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口岸知识分子”。他们以西方文化为镜,反思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批判中国社会,为近代中国设计了一幅幅社会改革的宏伟蓝图。本书的研究对象王韬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口岸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通过考察他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活动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历程,总结中国传统士子文人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特征,探究其复杂的心理转变历程,描绘出中国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王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特别关注西方诸强国和日本的发展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并留下了相应的著述,这就使得对他的研究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意义。人类不可能脱离生存的环境而独立存在,就文化史的发展来讲更是如此。人的意识实际上是由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不可能产生超越特定历史条件的思想和意识,

也没有超越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存在的人物。在当时看来纯属偶然的一切历史事件,实际上其背后都存在着历史必然性。王韬独特的个人经历实际上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促成的,所以必须将其放到当时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

一 中国近代“口岸知识分子”活动的历史语境

在中外文化关系中,在近代之前,中国一直以宗主国自居,将前来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或者文化活动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统统视为被皇威感化的蛮夷,清朝也不例外。在清代,中英关系的发展历程是当时整个中外文化关系的一个缩影。当英国政府最初派遣使者来中国寻求发展两国的外交、贸易关系时,因为无法接受清朝统治者所提出的在他们看来苛刻而屈辱的“跪拜”仪式,这一计划最终宣告破产。1787年英国政府派卡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为使节,与清政府直接交涉,希望中国取消对互市的限制,给英商以便利;并希望两国发展互换使节,建立长期、稳定的外交关系。但是,卡茨喀特不幸于途中去世,这次交涉胎死腹中。1792年,英国政府又委派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全权使节,与清政府进行交涉。因为乾隆要他跪拜觐见,而马戛尔尼只肯按照英国的礼仪对乾隆行礼,双方产生了齟齬,不欢而散,英国所提出的驻扎使节的要求因为“不合体制”而被毫不客气地拒绝。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来中国,希望能获得与中国商人自由贸易的权利。结果,阿美士德因为不肯行跪拜礼而被立即驱逐,命运比马戛尔尼还要悲惨。双方的交涉不可能获得圆满的结果,因为中英两国政府在思想观念上南辕北辙:英国政府要求两国建立近代型的经济贸易关系与外交关系,而清政府则认为凡是来到中国的国家都是大清王朝的臣属国或进贡国,他们必须对大清皇帝惟命是从、毕恭毕敬,绝对不可以和大清帝国平起平坐,否则一切免谈。这是强大的大英帝国无法接受的。当时英国已经发展成为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而大清皇帝和他的臣民们却依旧沉睡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对此一无所知。很多研究者总强调英国在这两次的外交交锋中的失败,而忽略

了事件的两面性,那就是当英国使节要求遭到拒绝悻悻而回的时候,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他们对清政府的政治腐败、武备废弛、闭目塞听已经有了亲身感受和相当全面的了解,这为他们其后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充足的依据。目前历史教科书叙述鸦片战争时,通行的做法很容易把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禁烟联系在一起,认为因为他领导了禁烟运动因此才导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实事实非常明显,当清政府所采取的限制海外贸易的政策妨碍了英国的利益,冲突已经无可避免,英国政府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借口。

鸦片战争前后与西方人士和西方文化有所接触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清政府所任命的直接处理“夷务”的政府官员。他们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熟读经书,但是对西方国家的情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由于清政府明文规定,禁止政府官员跟“夷人”接触,所以他们与西方人基本上没有直接接触。在与西方国家以及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极度鄙视西方人,不屑于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经常在形势的判断上出现严重的失误。

林则徐被当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备受人们赞赏,就他作为清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首先关注西方、了解西方这一点来讲是无可置疑的,为了了解西方,他确实做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举动。林则徐(1785—1848),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主义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他所领导的禁烟运动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办理夷务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了了解西方情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想方设法招募懂英语的人才如袁德辉等人翻译《四洲志》等关于西方史地的材料,翻译澳门出版的英文报纸,为国人尤其是清政府当局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遗憾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当局并不关心他所提供的关于西方的材料。但是,在他任职期间,虽然当时他实际上有很多跟西方人交往的机会,但他也总是尽量避免跟西方人有事实上的接触以免招来非议。1839年伯驾托人给患有疝气的林则徐送去疝气带,并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疝气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从他所说的症状看来,他似乎还有气喘,我给他

送去一份药。为了向我道谢,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①伯驾十分重视这次交往,并“专门为林则徐立了一张病历书,编号为6565”^②。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他请伯驾医生为他治疗疝气时,也是自己佩带了事,虽然伯驾再三强调需要患者本人亲自前来由医生为他佩戴疝气带更为有效。他对西方国家依旧有许多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错误认识,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他甚至曾声称夷兵“浑身裹紧”、“腿脚直扑”,一旦摔倒了爬都爬不起来,杀掉他们简直跟宰牛杀羊一样简单^③,因此对付英夷简直易如反掌,毋庸忧虑。

这种错误认识不仅在林则徐身上存在,在其他办理洋务的官员身上同样存在。直隶总督琦善在奏折中声称,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英国人便会大便不通而死:“夷地土地坚刚,风日燥烈,又每天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茶叶大黄便为通肠之圣药。”^④因为西方国家每年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和大黄,因此,在琦善看来,大清帝国实际上掌握着对夷狄生杀予夺的权力。

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责怪林则徐们或者琦善们当时对西方认识的肤浅,对外部世界缺少最基本的认识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我们大概不能过于夸大了林则徐的世界眼光。绝大多数办理夷务的官员一直认为(当然大清的皇帝们想法更是如此)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大清帝国完全可以自给,不需要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因此一直把准许西方人来华贸易看作大清帝国对他们的施舍和恩惠。在军事上他们则普遍认为夷人不堪一击,不必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对手看待;但一旦受到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他们又常常夸大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闻风丧胆,导致在交战时一败涂地。

魏源可能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一位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国家对华影响之大的清朝官员。他明确指出,西方国家的入侵使得中国社会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pp.624—639.

②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③ 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679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22页。